

辛亥革命萬歲！

——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決定的體會

毛 磊*

1941 年 10 月 6 日，為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紀念今年雙十節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¹ 這在中共 90 年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在《決定》中，提出了“辛亥革命萬歲！”的口號，這在中共 90 年的歷史也是很突出的。因而研究此《決定》就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為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專門作出《決定》是中共史上惟一的一次

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中共在 90 年的歷史中，發出了不少的文件。這些文件按其重要性可分為很多類。第一類是“通知”，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通知，如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第二類是《告民眾書》。如 1927 年 10 月 10 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辛亥革命紀念告民眾書》。第三類是《宣言》。如 1937 年 7 月 15 日發佈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第四類是“指示”，如 1938 年 5 月 22 日發出的《中央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第五類為“提議”，如 1938 年 3 月 1 日發出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會議的提議》，第六類為“綱領”，如 1921 年中共成立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1937 年 8 月 15 日公佈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七類為“決議”，如 1945 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八類為“決定”等，還有一些形式，如“章程”、“聲明”、“報告”、“函電”等等，不再一一列舉。至少在十種以上。

羅列以上中共中央文件的許多種類，主要想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在上述十多種文件中，除“綱領”“章程”為黨內帶有根本性的文件外，如果以對某個

歷史事件、某個重大問題、某個人作出結論或作出決策時，以“決定”為最高檔次。就是說中共中央如果對某件事或人作出了《決定》，那全黨就要堅決執行，其權威性是最高的。當然，“決議”、“指示”等，全黨都要執行，但與《決定》相比較，後者的肯定性就更高些。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共中央於 1941 年 10 月 6 日作出的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決定》，全黨就必須堅決執行，沒有回旋的餘地。說明中共中央對辛亥革命的高度重視。自此以後，中共中央雖然對紀念辛亥“逢十”時也很重視，如 1981 年紀念辛亥革命 70 週年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紀念大會上作了長篇重要講話。1991 年和 2001 年，江澤民在紀念辛亥革命 80 週年和 90 週年的大會上都作了重要的講話。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作出了紀念活動的通知。但都不是專門作為一個《決定》。因而 1941 年的《決定》在中共 90 年歷史是惟一的一次，值得認真研究。

二、中共中央提出的“辛亥革命萬歲！”是對辛亥革命的最高評價

《決定》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是很高的。特別是在《決定》結束時提出：“辛亥革命萬歲！”的口號，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還是第一次。為了使讀者對這個評價有全面的瞭解，現把《決定》中對辛亥革命的評價部份作詳細的摘錄如下：

“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週年紀念日，全國各地應當舉行熱烈的慶祝與紀念。各地共產黨員應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使每個中華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這一天……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幾千年生活中有着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天。雖然由於種種原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因，特別是由於當時革命陣營中包藏者投降袁世凱的妥協分子，……致使當時轟轟烈烈的武昌和全國各地的革命起義遭遇着極大的挫折，使這次革命在實際上歸於失敗了，但是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治是已經被推翻，而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體是已經被確立了。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與民權自由的偉大鬥爭，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此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鬥爭，乃能因國際國內新因素的成長(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民族資本與無產階級的發展)而發展到明確的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制度的階段。於是乃有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乃有國民黨的改組，國共合作的實現與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執行，乃有北伐革命戰爭和紅軍的英勇奮鬥，乃有今天全民族的偉大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人民沿着辛亥革命的道路，為民族民主革命堅持不懈，百折不撓，三十年如一日。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一切真誠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對於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誓與全國一切革命真誠志士一道，誓與全國人民一道，繼續奮鬥，不達目的，決不休止。對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一定要使之徹底實現於全中國。對於孫中山先生和當時無數視死如歸的英雄豪傑，以及三十年來一切為民族解放與民權自由而奮鬥的愛國志士與愛國人民，我們謹致深切的敬意”。²

從上述中共中央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中，給我們有許多的啓示，內容是很豐富的，這裏只提出以下兩點值得我們很好的學習與研究。

(一) 如何正確看待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

這是一百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但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卻早在 1941 年就作出科學的答案。即正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決定》的行文是很科學的。即一開頭就明確提出 1911 年 10 月 10 日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幾千年生活中有着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天。這是一個前提，就是說首先肯定辛亥革命有着偉大的歷史意義，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共有 180 萬天，1911 年 10 月 10 日這一天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就把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這一天放在整個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重要的一天的地位。這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意義。《決定》接着說：“雖然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由於當時革命陣營中包藏着投降袁世凱的妥協分子……致使當時轟轟烈烈的武昌和全國各地的革命起義遭遇着極大的挫折，使這次革命在實際上歸於失敗了，但是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治是已經被推翻，而中華民主共和國的

國體是已經被確立了。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與民權自由的偉大鬥爭，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這段話對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兩者之間的關係作了科學的回答。即“成功”是主要的，是主流，而“失敗”是次要的，是支流。這是《決定》的真實內涵。不僅開宗明義指出辛亥革命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上的偉大意義，而對失敗只用“雖然”失敗了，接着卻用“但是”這個詞，即筆鋒一轉，立即指出辛亥革命開闢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即結束君主專制而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國體。一個“國體”的轉變，是一個國家劃時代的歷史進程。中國由專制國體向共和國體的轉變，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偉大歷史轉折。有人對於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看不到它的主流，而只抓着一些支流，強調其失敗的一面，這就是沒有從本質上，主流上看問題的結果。

本來在 1941 年中共中央的《決定》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在隨後的時間裏，卻不斷有人對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之間的關係作出不恰當的評述。最突出的就是在“兩分法”中把“成功”與“失敗”並列。不分主次。這方面的代表作是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該書第一章第一節的標題就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作者一方面指出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使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這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中國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從而為此後革命鬥爭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取得的勝利是巨大的。”這個肯定的評價是很中肯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作者另一方面卻認為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妥協告終。……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依然處在極端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失敗了。”³ 這個分析的本身也沒有錯。因為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看到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看到人民的困苦，他曾沉痛地說：“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既然“兩分法”能全面評價辛亥革命，既看到它的勝利，又看到它的失敗，而且有根有據，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為甚麼又說這種“兩分法”不妥當呢？問題發生在那裏呢？

本人認為“兩分法”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關鍵問題是為甚麼要強調辛亥革命失敗的一面呢？特別是書的第一章第一節的大標題把成功與失敗相提並論，使人感到辛亥革命的價值並不那麼高，辛亥革命只不過趕走了一個皇帝而已，而且這個末代皇

帝是一個三歲的小孩子。說明辛亥革命的意義並不重大。相反的從中得出結論是：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更重要。這就是“兩分法”引伸出來的不良後果。

本人說“兩分法”本身沒有錯，是指辛亥革命的確未從根本上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這個失敗是客觀存在的。但為甚麼又說“兩分法”不妥呢？這是因為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次革命性變革。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後人卻沒有因為其有失敗的方面而降低對其評價。如法國的大革命是很徹底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但革命後仍有多次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人們並未因此而否定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而且史書也沒有更多的強調其失敗的方面。沒有說法國大革命既是成功的也是失敗的。也就是沒有對法國大革命採取“兩分法”。

在這裏，要介紹胡錦濤關於中國三次革命的理論來印證中共中央《決定》的科學性，即胡錦濤總書記於2008年12月18日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先後發生了三次偉大革命。第一次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第二次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第三次革命是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廣闊道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⁴ 用此理論中國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與不足，也可以說明“兩分法”是不妥的。按胡錦濤三次革命的理論，即第二次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三大改造的成功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成功也是了不起的。在一個數億人口經濟落後的大國，不經過流血鬥爭就由私有制社會變成公有制社會。到1975年時，更由於“割資本尾巴”的加快，公有制經濟佔全國國民經濟的98%以上，私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只佔不到百分之左右。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了。人民走上了金光大道。對於這次革命的另一面，即不足的方面，中共中央用四句話加以概括，即在合作化運動中要求過急、工作過粗、速度過快、形式過於簡單劃一。這些不足只是一些枝節問題，並沒有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問題。這裏可以提出一個問題。1956年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取得偉大勝利，就是指的消滅了私有制。工作上的“四個過於”只不過是美中不足

罷了。但據2008年的不完全統計，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民有經濟(實質上就是私有制)已佔有一半以上。而且這個比重還將繼續增長。有人會問：既然1956年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這個勝利的內容就是消滅了私有制，而現在的私有制在全國的經濟中已超過半壁江山，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這不是從事實上否定1956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嗎？

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呢？本人認為應歷史地看待此問題。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提供了前提條件。在此正確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經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的洗禮，終於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中重要內容就是經濟成分不能過於簡單劃一，而應發揮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因而決定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所謂公有制為主體，不一定要在數量上佔大多數。這個經濟制度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正因為1956年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到上世紀80、90年代，才可能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沒有1956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就不會有今天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只要公有制佔主體地位就不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所以不能以此否定1956年三大改造的成就。也就是說不能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採取“兩分法”，說它即是成功的，也是失敗的。失敗的表現就是私有制不僅又恢復了而且大大發展了。這是不可取的。

問題又發生了。既然在第二次革命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又出現大量的私有經濟而沒有說它是失敗的。而對第一次革命成功後遺留問題也很多，也不應強調它的失敗方面。不應有兩個標準。而應對三次革命採取同一的評價標準。因為胡錦濤已把這三次革命不分彼此的排列在一起，就是要求人們以同等的標準去觀察這三次革命。第三次革命正在進行中，前兩次革命均擔負着自己應完成的歷史使命，只要把應負的歷史使命完成了，就應該說它是成功的。第一次革命要完成的任務就是結束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中國進步的閘門，只要完成這個任務就是勝利。不應該也不可能要求它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一次解決，“畢其功於一役”是不現實的。不能因此而說它是失敗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只要完成此任務就是勝利，至於中國今

後如何發展社會主義，那是第三次革命要完成的任務。不能因為 1956 年沒有解決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而說三大改造是失敗的。我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去對待第一次與第二次革命。當然，在當前進行的第三次革命已取得驚人的成就，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震驚世界的變化。但也發生過諸多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就使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鄧小平果斷地處理了這次風波，使黨和國家沿着第三次革命的道路闊步前進。當前仍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不能以此而否定第三次革命的偉大成就。歷史就是在曲折中前進的，決不會像北京東西長安街那樣筆直和平坦。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中國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政黨。1997 年在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指出三次巨變和產生三個偉人的論斷後，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又前進了一步。如 2002 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關於辛亥革命的標題就沒有用 1991 年版的標題：“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而是用“辛亥革命及其後的中國政治”。⁵ 這就是在江澤民的“巨變論”發表後產生的積極影響。儘管該書也用了辛亥革命“失敗”的詞句，但卻沒有鮮明的“兩分法”的提法。表明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緊跟黨中央的。這個改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的精神。

（二）關於辛亥革命與中共成立的關係問題

《決定》對此有明確的表述，即有了辛亥革命，才有中共的誕生。即辛亥革命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去認識。

1. 辛亥革命為中共創始人接受馬列主義創造思想上的條件

中共最初的五十多名黨員及其創始人，原來都是民主主義者。只有民主主義者才能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滿腦子封建思想的人決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更不能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他們為甚麼成為激進民主主義者呢？主要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對他們的影響。中共五十多名黨員中，有少數參加了辛亥革命，而大多數則是青少年，還是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而此時，他們受到的正是民主思潮的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毛澤東就深受辛亥革命的影響。當他從《民立報》看到廣州起義失敗的報道時，毛澤東說：“我深為這個故事所感動，並且還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內容。”說明毛澤東到長沙就被孫中山領導的革

命所吸引，辛亥革命的爆發更是引起毛澤東的激動，他決定“參加革命”並參加了湖南革命軍。時間雖然不長但說明辛亥革命對毛澤東的影響之深。在隨後的日子裏，毛澤東一直追隨孫中山的足跡前進，正如他在紀念孫中山 90 誕辰的文章中所說的：“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再看中共另一位創始人之一的陳潭秋。陳潭秋的五哥陳樹三是共進會成員。參加武昌起義後隨黃興前往南京。在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任職，不幸以身殉職。這對年僅 16 歲的陳潭秋幼小的心靈是個極大的刺激。他決心繼承兄長的遺志從事民主革命。在新文化運動中，陳潭秋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每週評論》，成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為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奠定了基礎。大批知識分子從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造成一大批現代的知識分子。這是辛亥革命帶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的結果。在辛亥革命前，皇帝在人們心中是至高無上的，這種封建思想統治中國幾千年。但是，辛亥革命發揚“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把皇帝打倒在地。既然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可以被打倒。那麼，還有甚麼腐朽的東西不能打破呢？所以說，辛亥革命把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就像長江之水，洶湧澎湃奔騰向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新文化運動的氣勢磅礴就是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成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只有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人，才有可能接受馬列主義，才可能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思想條件。

2. 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提供了階級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沒有工人階級作基礎，黨就是空中樓閣，就不可能產生共產黨。在辛亥革命前，中國工人階級的總人數約 50 萬人左右。可以說數量不多，還沒有形成為階級。但是辛亥革命後，在孫中山“振興實業”的號召下，出現了興辦近代工廠的新的熱潮。加之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國家忙於在歐洲戰場上廝殺，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此期間得到了相當的發展。1914-1919 年的 6 年間新設廠礦 379 個，平均每年增設 63 個。從投資工業的資金來看，1917 年工業投資超過前 50 年工業投資的總和。伴隨而來的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進一步發展和壯大起來。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達 200 萬左右，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會力量，勞動和資本間的矛盾，成為人們日益關注的重大問題。五四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即六三

運動時，工人階級就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中國工人階級已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已由零星的分散的、經濟的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鬥爭”、“滙合成階級鬥爭”。沒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在五四運動前形成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這就為中國接受馬列主義提供了客觀的階級基礎，為黨成立準備了階級基礎。

3. 辛亥革命為中共創始人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與教訓

辛亥革命也有它的重要弱點，就是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孫中山曾痛苦地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但是，這個失敗的教訓，卻是中華民族一份極為珍貴的歷史遺產。中共創始人正是在接受這些教訓的基礎上，才創立了中國共產黨。

辛亥革命的根本教訓是甚麼呢？主要在於革命黨本身存在着嚴重的問題。同盟會的組織本來是十分鬆散的，辛亥革命很快取得了勝利，更使許多會員感到心滿意足，急於享受已經得到的那麼一點果實，因而內部的爭權奪利就開始了。孫中山雖然看到這個問題，把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後，只是表面上擴大了組織，卻掩蓋不住內部的渙散、混亂、政客與軍閥的混入。這個黨雖然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張的三民主義，確實抓住了近代中國的三個要害問題，具有重大意義。但是，要把它變為現實，必須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但同盟會在這方面卻表現的十分軟弱。這樣的黨，要戰勝異常強大的敵人是不可能的。要在複雜的環境中領導革命繼續乘勝前進，也是辦不到的。這個教訓告訴我們：要想從根本上摧毀根深蒂固的反動勢力，在中國建立一個光明的社會，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就需要有一個能夠正確地把握前進航向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作為革命的引路人，作為團結廣大群眾萬眾一心地進行鬥爭的核心。

辛亥革命提供的這個歷史教訓是極為重要的，正是這個教訓，啟發了許多先進人們去探索建立一個能領導中國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進行到底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個歷史教訓的啟發下產生的。中共創始人認識到要把辛亥革命的事業繼承並發展下去，就必須建立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從毛澤東與蔡和森的通信中就明顯看出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共產黨以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蔡和森在信中說：“我對於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於

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我以為先要組織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而毛澤東在信中表示：“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地贊同。”董必武在回憶為甚麼要建立共產黨時曾說：我們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但“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於是我們就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開始讀馬克思主義，從而按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吳玉章在回憶為甚麼要建立共產黨時說，他從辛亥革命以來的實踐中認識到“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不可”，而“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這就是說，中共早期黨員是從辛亥革命的失敗中清醒過來的，接受它失敗的教訓，只有組織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

另外，耐人尋味的是：中共“一大”是在辛亥革命元老人物李書城寓所舉行的。武昌起義後，李書城任漢陽總司令部參謀長，是黃興的得力助手，其弟李漢俊，是中共創始人之一，說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是辛亥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甚至在細節上也可以找到兩者的關係。

總之，辛亥革命客觀上為中共的成立作了以上幾方面的準備。十年後即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是辛亥革命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作出的又一大貢獻。

三、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堅決執行中央的決定

中共中央的決定於1941年10月7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後，各級黨組織熱烈響應，堅決貫徹執行。

（一）中共中央西北局首先響應

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首先即作出幾項決定：第一，延安各團體、機關、部隊、學校與各級黨組織應很好學習中央的《決定》。第二，延安市放假三天（10月9、10、11日）以示慶祝。第三，延安的各交通要道皆搭起高大的彩樓，懸掛布制的大標語，其內容為“辛亥革命萬歲！”、“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萬歲！”、“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萬歲！”、“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萬歲！”等。

（二）延安召開三萬人參加的慶祝大會

1941年10月10日，延安各界三萬多人在延安青

年體育場集會，隆重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大會推舉朱德、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及國民政府軍委會聯絡參謀陳宏謨等為主席團。大會追憶孫中山締造共和的豐功偉績，強調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堅持團結把抗戰進行到底。最後大會向全國軍民發出通電，誓為保衛祖國而戰。晚間，延安四大禮堂舉行晚會，可以說延安紀念辛亥革命的盛況空前熱烈。加上延安市數區的參議員也在這一天進行選舉，民主氣氛更加熱烈。自晨至晚，整個延安浸沉在盛大節日的歡樂中，充分說明解放區人民響應中共中央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號召，對孫中山和辛亥志士們所建立偉大功勳的崇高敬意！⁶

（三）各解放區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

新四軍軍部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於 1941 年 10 月 10 日在蘇北某地舉行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大會。雖然會場距離日本侵略軍只有數十里，但新四軍作了嚴密和佈置，確保會場安全。大會會場佈置莊嚴，孫中山遺像及大幅標語琳瑯滿目，到會人員上萬人，情緒熱烈，盛況空前，附近軍民張燈結綵，鑼鼓喧天，人群熙熙攘攘。說明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在敵人的威脅下，仍隆重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可算是光輝的一頁。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冒着生命危險去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這在中共 90 年歷史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更是國共關係史上的一段佳話。

晉察冀邊區於 1941 年 10 月 10 日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大會的特點是與五台大捷收復阜平縣的慶功大會合併舉行。這也是按照中共中央《決定》精神進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們應號召全國軍民慶祝蘇北、五台、長沙三次大捷”。這裏所說的五台大捷是指 1941 年秋日偽軍七萬餘人多路出動，對晉察冀邊區進行“掃蕩”，企圖對邊區黨政機關和主力部隊進行“鐵壁合圍”後加以消滅之。邊區部隊留一部分兵力與民兵結合，在內線遲滯、消耗敵人，而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迅速轉移到安全地帶，主力部隊則按計劃到鐵路沿線和日軍的側後，打擊敵人，使“掃蕩”之敵連連撲空，疲於奔命。與此同時，晉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中等區軍民也積極攻擊當面之敵，配合北嶽和平西軍民的反“掃蕩”。9 月末，日偽軍被迫撤退。晉察冀軍民乘機集中力量開展襲擊、伏擊和迫擊作戰。在歷時兩個月的作戰中，殲敵五千五百餘人，粉碎了日軍摧毀北嶽、平西抗日根據地的企圖。是為“五台大捷”。晉察冀邊區黨政軍領導遵照中共

中央《決定》把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與慶祝五台大捷結合進行的要求。在大會主席台前陳列此次大捷所獲戰利品多件。到會人員更加興奮。大會開始後，首先向辛亥革命 30 年來為中華民族復興殉難的烈士及此次反“掃蕩”中殉國的勇士們致哀。接着舉行了隆重的武裝檢閱，表示堅持抗戰，驅逐敵寇，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這也是按照中共中央《決定》進行的。《決定》明確指出有了辛亥革命“乃有今天全民族的偉大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人民沿着辛亥革命的道路，為民族民主革命堅持不懈，百折不撓，三十年如一日”。這段話說的很清楚，即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也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而，晉察冀邊區把紀念辛亥革命與祝捷大會結合進行，是中國共產黨人繼承辛亥革命的一個典範。⁷

在晉冀魯豫邊區。不僅邊區政府所在地熱烈隆重的舉行了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大會，而且在所屬的所有縣政府所在地也同樣舉行了紀念大會。這在中共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邊區各縣的抗日團體也組織宣傳隊，向人民群眾說明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這是執行中共中央《決定》的具體表現。因為《決定》明確要求：“各地共產黨員應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使每個中華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這一天……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生活中有着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天”。晉冀魯豫邊區各級黨政機關堅決執行中央的《決定》，向邊區人民廣泛宣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在 1941 年抗日戰爭處於艱難階段的時刻，邊區政府能作到向人民廣泛宣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充分說明中共對辛亥革命的高度尊重。

（四）《解放日報》開闢紀念辛亥革命週年特刊

為了向全國人民廣泛宣傳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解放日報》於 1941 年 10 月 13 日，開闢了一個特刊。其中，把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雙十演講全文轉載外，還特別刊登了林伯渠、朱德、吳玉章等辛亥元老人物的文章。他們在文章中除高度評價孫中山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歷史性功績外，特別提出要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就是要堅持團結、堅持抗戰，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總之，中共中央的《決定》發出後，全黨堅決執行，在解放區形成了一個慶祝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熱潮。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堅持抗戰作出了重大貢獻。

四、幾點啓示

中共中央關於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決定》已經過去 70 年了。現在讀起來仍然使人興奮，發人深省，給我們很多啓示。

（一）《決定》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支持者、合作者

在抗日戰爭處於艱苦階段的 1941 年，中共中央仍然能作出《決定》，在全黨開展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的各項活動。這本身就表明中共對辛亥革命的高度重視。把此項活動作為黨的一項重要任務去完成，當作自己的事情去辦，而且用《決定》的形式要求全黨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這在中共 90 年歷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值得我們重視對此文獻的研究。本文這裏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更多學者深入研究這個歷史文獻。

（二）早在 70 年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辛亥革命萬歲”的口號

70 年前中共提出“辛亥革命萬歲！”的口號，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時，更加使人感到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度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人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人尊重歷史，尊重創造的高尚氣概。吳玉章在 1941 年 10 月 13 日的文章中也以“辛亥革命萬歲！”作為他的結束語。說明中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是很高的。但我們對此卻缺乏研究，更沒有加以宣傳。以致後來有人降低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溫故而知新”。

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時，我們重新學習中共中央提出的“辛亥革命萬歲！”這個響亮的口號，有着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三）中共中央《決定》把紀念辛亥革命與現實的鬥爭結合起來的典範

中共中央認為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是完成孫中山未竟事業的重要階段。辛亥革命與抗日戰爭這兩者有着內在的聯繫。不僅沒有矛盾，而且關係極為密切。以紀念辛亥革命去推動抗日戰爭也是時代的要求。各解放區舉行各種活動紀念辛亥革命 30 週年，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從而推動全國軍民團結一致的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的抗日事業向前發展。這個結合做的很好。值得今天借鑒！

（四）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執行表明了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損

《決定》在各解放區得到了很好的落實。因而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各解放區以此為契機，勇猛地打擊日寇，度過了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並於 1945 年 8 月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可以說抗日戰爭勝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的結果。這個鐵一般的歷史事實說明：國共兩黨合作，不僅對中華民族有利，對於兩黨的自身發展也是有利的。國共兩黨只應合作，不應分裂與對抗。

註釋：

- ¹ 《中央關於紀念今年雙十節的決定》，載於《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 年，第 747 頁。
- ² 同上註。
- ³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第 5 頁。
- ⁴ 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 3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一版。
- ⁵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8 頁。
- ⁶ 見《解放日報》，1941 年 10 月 11 日。
- ⁷ 同上註。